

◎ 新清华文丛 ◎

汉魏文学与政治

● 孙明君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文学与政治/孙明君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新清华文丛)

ISBN 7-100-03632-1

I. 汉… II. 孙… III. ①文学-关系-政治-中
国-汉代-文集②文学-关系-政治-中国-魏晋南北
朝时代-文集 IV. I20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94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新清华文丛
汉魏文学与政治
孙明君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3632-1/I·12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7/8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总 论 篇

审音以知政——关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思考	1
居世一何不同——汉魏文学研究中应该正视阶级	18
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 ..	35
诗可以怨——孔子“思无邪”与汉儒“温柔敦厚”辨异	53

分 论 篇

汉武帝与儒家诗教	64
第三种势力——政治视角中的鸿都门学	86
建安士风的走向	106
荀彧之死	119
建安诗人对生命悲剧意识的消解	127
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	146
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作年考	161
嵇康与文士道教	170
酒与魏晋咏怀诗	187

附 论 篇

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	202
------------------	-----

2 汉魏文学与政治

解读“诗史”精神·····	215
20 世纪建安文学研究反思·····	230
天人合一与古代诗歌情感·····	244
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 与瞻望·····	258
后记·····	277

审音以知政

——关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思考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在许多时期都属于敏感的热点性的话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内含了两个相关的子问题:一是研究者对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一般性看法,二是对某一特定时期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看法。所谓的特定时期也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作家、学者对当今政权、政治的态度,对当前文学与当前政治之关系的态度,这时的研究具有现时性的特征,作家和学者不仅要表明自己对眼前的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看法,还会涉及对理想中的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设计与描绘。另外一个方面是对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历时性的研究,即对已经过去的不同历史朝代的文学与政治之复杂关系的剖析。对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一般看法属于哲学研究范畴,要求学者侧重于理论性的深入思索,对一定时期的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探究属于史学研究范畴,要求我们对某段历史进行细致地梳理和认真地反思。当然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理论来源于对历史事实的总结与思考,同时又指导着对历史的研究。昨天的历史会给今天的理论研究以参照和启迪,今天的理论思考就是建立在昨天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本课题探讨的是汉魏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属于历时性的研究。但在进入研究之前,首先

标明作者对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一般看法是不可缺少的。

—

从不同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种种对文学的定义:比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艺术表现,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等等。不论怎么定义,文学创作都无法离开审美的主体——人。社会生活当然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定义中似乎没有“人”字出现,但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没有人、没有人类情感的介入就没有文学作品。人类的情感世界无所不包,其中有一份情感是与政治相关的情感。在情感的世界中,政治情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文学的视角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有自觉自愿地为某一政治服务的文学,也有在强权政治下不得不被动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文学,还有利用创作作为反抗政治之工具的文学,也有以文学作为麻醉自己的手段、以想象的世界作为避难之所的文学。文学和政治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关系纠缠纠结,难以厘清。

有一些概念虽然挂在我们的嘴上,但很难对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政治”一词即是一例,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千差万别。也许正是“政治”的复杂性注定了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复杂性吧。

有人对于政治或政治性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20世纪后半期风行世界的文化研究强调的则是社会政治而不是党派政治。社会政治关注的核心是人际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在凡有人际关系的地

方就必然有政治存焉。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当然无所谓政治问题,但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存在就必然存在权力关系,从而也就必然存在政治。西方的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显然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的意义上说的。”^① 按照这种理解,只要有两个人就会有政治,那么可以说人生天地之间无往而非社会政治,这显然是一种泛政治论。此论既然有其广大的市场,多年来能够风靡欧美,必然也有其内在的道理。性别政治、种族政治的确也是政治之一,它们属于 20 世纪的“新”政治,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文学与政治之关系中的政治。本文所要讨论的政治不是这里所说的党派政治,也不是两人之间就存在的社会政治。

与这种对政治的宽泛的理解不同,也有人对政治的理解比较窄狭。马克斯·韦伯是这样定义政治的:“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的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请注意,‘疆域’乃是国家的特征之一。现在的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② 马克斯·韦伯的国家指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国家,和古代的国家并不完全一致。他这里特别强调了暴力、权力对于国家和政治的重要意义,的确暴力和权力对于政治来说极其重要,但政治的内涵应该是丰富的,并不是

① 陶东风《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思考》,《文艺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22 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55 页。

暴力和权力所能概括的。与政治相关的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政府官员,或一国之内的团体首领之间,政治不仅波及了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也涉及到了诸多没有任何官职的布衣之士。

长期以来,国人所熟悉的“政治”的定义见于1979年版的《辞海》:“(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予经济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经济利益是各阶级最根本的利益。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彼此之间必然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处理阶级关系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政治所要处理的关系,包括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其表现形式为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剥削阶级的政治以压迫劳动人民、维护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为目的。”这种对“政治”的定义揭示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夸大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非常具有时代的特征,很容易让人想到已经过去了的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所谓的政治路线、政治方针、政治政策、政治任务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

本文所认同的政治不是那种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社会政治,而是具体指与政权、政府、政策相关的国家政治。本文所认同的政治也不仅仅指暴力、权力和阶级斗争,而是包括了非暴力的成分,包括了在两个对立阶级之外的成分。我们所认同的政治是: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和个人在国内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与一定政权相关的举动和态度。阶级、阶层、民族、集团是国家的要素。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是政治的根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政治的影响,每个人都具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心理、

政治感情、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一些政治家和研究政治的学者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系统的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

二

如果说一部分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是任何人都不会反对的。人们所争论的焦点乃在于是不是所有的文学都应该具有政治性,文学是否一定从属于政治并且必须应该为政治服务。

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本中看,所有文学家都在关注着政治局势的变幻,大部分文学作品都与政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文本中,不具有政治性的文学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把文学中表现的情感分为人与人之情感、人与社会之情感、人与自然之情感,那么文学的政治性主要反映在人与社会的情感中,在另外一些情感类型中政治性的表现就没有人与社会的情感中那么明显。在人与人的情感中和人与自然的情感中,比如友情、亲情、爱情、山水、田园、咏物的文学作品中,就有一些政治性不太明显的甚至不具有政治性的作品。

在古代中国诗学理论中就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对峙。从文学是否从属于政治并且为政治服务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文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文学理所当然的应该从属于政治并且应该为政治服务;二是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文学不必服从于政治并且没有必要去为政治服务。凡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已经丧失了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

文学为什么应该从属于政治并且要为政治服务呢?让我们先

来看看持这种观点者的理由。

在封建时代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在封建时代正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毛诗序》是这样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学就是社会政治的风向标，一方面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动荡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对社会政治又有巨大的教化功能。

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曰：“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礼乐和孝悌、衣食同样重要。包括文学在内的乐，直接关系到在封建国家中君主能否指挥臣子、父亲能否指使儿子的重大问题。

唐代诗人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序人伦，安国家，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二者所以并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也。何则？礼者纳人于别，而不能和也，乐者致人于和，而不能别也，比待礼以济乐，乐以济礼，然后和而无怨，别而不争，是以先王并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诸掌耳。”（《策林·六十二议礼乐》）作为诗人白居易自觉自愿地用文学写作时事，为现实政治服务，在他的思想深处所认同的乃是以礼乐治理国家的儒家传统观念。

不仅仅是白居易，所有的正统的封建时代的士人都一样，在他

们看来,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是天经地义的,包括文学在内的乐与礼一起构成了封建国家战车上的两个轮子,礼乐关系到了国家是否安定、民众是否忠孝、教化能否推行、风俗是否醇厚等重大的问题。鉴于以上重大的原因,文学当然要为政治效忠了。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①此时梁启超所提倡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之内涵完全不同于两千年前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之内涵,但他对小说的推重和《毛诗序》对诗歌的推重没有本质的区别,《毛诗序》认为诗歌可以“动天地,感鬼神”,梁启超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异曲而同工,两者都强调并夸大了文学作品对现实政治的作用。

1925年苏联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会议决议中指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强大武器。……阶级社会中的文艺不仅不可能是中立的,而且是积极地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②这种思想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70年代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曾经这样训导我们:

阶级社会的文学,既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也就必然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并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政治原是经济的集

①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② 《“拉普”资料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中表现,而且只有通过政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阶级社会的文学,从来就是,现在也是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①

长期以来,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是人所皆知的“三论”,是作家在文学创造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我们知道,从文学家的角度看政治与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文学是会产生不同结果的。从政权拥有者的角度看,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希望文学能够为自己的政治、政权服务,没有任何朝代的统治者会支持敌对势力的文学创作。固然如此,但我们不能不说,让文学成为政治的婢女,在极“左”的年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的盛行,导致当时的文学创作忽视了文学固有的审美特征。在抛弃了文学的审美特征后,实际上是政治决定文学的走向,文坛被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所垄断。我们知道文艺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政治生活不是生活的全部。正由于如此,邓小平同志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弊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②

我们把新时期比喻为文艺的春天,就是从文学、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而言的。在冲破了极“左”思潮的藩篱之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对于文学服务政治的主张许多人弃置不顾。其实,对于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许多批评者

①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只是看见了消极的一面:文学被强迫为政治服务,沦为政治的婢女,而掩盖、忽视了另一方面:文学无法完全脱离政治,文学除了政治逼迫下为政治服务之外,文学还有主动为开明政治呐喊的功能。

从文学的视角看,文学的世界是广阔的,构成文学要素的成分是多元的,政治只是文学诸要素中的一元。但政治在文学当中不是普通的一元,而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生存者,作为极为敏感的人群,诗人对现实政治的感受力和体察力较其他人自然更为细致深刻。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① 不论诗人们对政治持何种态度,诗人皆无法摆脱与政治的纠葛。因而,记录着诗人性情的文学便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政治的液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便成为一种永恒的话语。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关注是多数诗人的共性。不论是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也好,还是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也好,绝大多数士人的心中都有难以消解的政治情结。

在一个政治的多极化的时代,文学相应的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此时文学要不要为政治服务、文学如何去为政治服务就取决于每位作家自己的良心,取决于作家自觉自愿地抉择。不过,不论是什么时代,作家要逃避政治的存在是很困难的。政治之无法逃避,就如同人之于日光的关系,文学中的政治性如同随身移动的影子。只要作家在政治的日光中行走,就一定会产生政治性的影子,除非你一直躲避在某种物体的遮蔽当中,不去直接面对政治的日光。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三

假如文学可以不从属于政治,并且文学没有必要为政治服务,那么文学的目的何在?古往今来,学者的见解是各不相同的,而且我们难以预测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主张,会提出什么样的主义。从大的方面看,学者们已经提出了以下种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为诗歌而诗歌,为审美情感而艺术,为人性而艺术等等。

在中国古代也有学者认为诗歌作品的美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声新”。宋人郑樵说:“呜呼!诗在声而不在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谓其辞义之美哉,直谓其声新耳!”(《通志·乐略·乐府总序》)但我们今天说到“为艺术而艺术”时马上想到的自然是在欧洲19世纪兴起的那股时代潮流,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说:“我们相信艺术的独立自主。艺术对于我们不是一种工具,它自身就是一种目的。在我们看来,一个艺术家如果关心到美以外的事,就失其为艺术家了。我们始终不了解意思和形式何以能分开。”^①这种观点在西方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共鸣。美学家克罗齐认为纯粹的艺术和道德没有关系,他说:

艺术不是意志活动所产生的。造成好人的善良意志不能造成一个艺术家。它既然不是意志活动所产生的,就与道德上的分别无关。……一个艺术家固然可以在想象中表现一个从道德观点可褒可贬的行动;但是他的表现,因为只是一种想象,不应该因此受褒或受贬。世间没有一条刑律可以定一个

^① 转引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意象的死刑或判它下狱,世间也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对它下道德判断。判定但丁的弗朗西丝卡为不道德的,或是莎士比亚的考狄利亚为道德的——这些角色对于但丁和莎士比亚纯为艺术的,好比音乐的音调一样——实无异于判定一个三角形为不道德,或是一个方形为道德。^①

安·塞·布雷德利主张:

诗歌性质在于它不应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部分,也不是它的摹本,根据我们通常对这个提法的理解,而应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独立、完整、自给自足。要想充分地把握它,你就必须进入那个世界,服从它的规律,暂且忽略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你的信仰、目标、具体境况。^②

他们认为艺术是一个自足的价值系统,文学内部的结构、情节、格律等等只是技术性因素,和政治、道德、教化没有关系。“所谓‘艺术’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类运用自己的技巧能力造成美的形式。……形式的创造是艺术创造的目的,至于这种精美的形式是否有实用的价值,则是次要的。”^③ 在这里作家所追求的就是艺术形式本身的美,其它的内容即使存在也已经退居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了。

与过分注重艺术形式美不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文学应该为情感而艺术。审美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功利价值无关,它呼唤的是人的自由解放的情感,它表现的是人性,即文学应该为人性而艺

① 转引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106页。

② 转引自[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武译,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③ 林兴宅《大探索——文艺哲学的现代转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术。所谓人性就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人所共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就是人性，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者心目中的人性。马克思指出：“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①这是无产阶级的人性观。今天，我们通常把性爱、母爱、友情、同情心、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等等皆看作普遍的人性，属于人类共同的本性。“文学既然是人的精神智慧的产儿，它的整个生命历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的制约和影响。沿着这条思路可以明白：文学的内容必然以人为中心，因而同人的本性、人的精神道德追求有关的人性、人道主义就成为不可回避的中心之中心；文学特征的根源必须从人的角度去揭示，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文学，不同的个人也有不同的风格，而人类的共同性又决定了文学的共同特征。”^②

我们认为，文学不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文学是丰富的，文学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文学可以表现丰富的情感，文学可以成为美的形式。政治生活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政治情感只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侧面。假如文学即是政治的命题成立，文学也就丧失了其自身的特征，文学只会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只为艺术而艺术，只为审美而艺术、只为人性而艺术，完全排斥了政治性，也会陷入误区。情感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7页。

② 汤学智《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世界、审美的世界也包括政治情感、政治美感。政治与人性是并列的,不是对峙的,更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关系,很多时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关系。

由于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对立,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淡化,恰恰相反,直到今天两者之间依然存在难以沟通的天堑。纵观古代中国,我们发现: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多会关注现实政治,受到道家思想熏染的士人则多会逃避现实政治。主张文学脱离政治的士人,大体上在现实政治中是不受统治者欢迎的人。如果一个时代出现文学脱离政治的时代呼声,此呼声汇聚为一股强劲的潮流,必然是上一个时代政治对文学有了过度地干预,现在的呼声是对过去时代的一种反弹。为艺术而艺术、为诗歌而诗歌往往是对为政治而文学的一种反动,自有其矫枉必须过正的历史价值。

四

如上所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历时性的问题。对文学与政治之一般关系的思考仅仅是研究的一个方面,进行历时性地探索——对不同时代中的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具体地探求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与政治之间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其间有共性,也有其个性,在此让我们以汉魏文学为例来予以观察。

汉魏主流文学与国家政治之关系的走势是这样的:由自觉为帝国的政治服务到质疑帝国的合法性,甚至到了汉末桓灵之世走上与朝廷对立的道路。建安之际士人开始重造天下,用文学再现